



文史哲博士文丛

《花间集》接受史论稿

◎ 李冬红 著

齊魯書社

◎ 李冬红 著

《花间集》接受 史论稿

齊魯書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花间集》接受史论稿/李冬红著. —济南:齐鲁书社,
2006. 6

ISBN 7-5333-1682-7

I. 花... II. 李... III. 词(文学)—文学研究—中国
IV. I207.2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63164 号

《花间集》接受史论稿

李冬红 著

齐鲁书社出版发行

(地址: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39 号 邮编:250001)

E-mail:qlss@sdpress.com.cn

日照报业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1 印张 2 插页 250 千字

2006 年 6 月第 1 版 2006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5333-1682-7

I·321 定价:22.00 元

序

赵山林

这几年来我指导的博士研究生，从专业来说属于中国古代文学专业，从研究方向来说有两个，一个是中国戏曲史与戏曲学，一个是诗词曲艺术研究，主要是词的研究。之所以选择这样的研究方向，从主观愿望来说，是想继承吴梅先生的传统。

词、曲是两种不同的韵文体裁，曲还兼有散曲、剧曲两种含义，但既然都属于韵文范畴，又都与音乐互为表里，因此二者的关系是至为密切的。二者都产生和成长于经济、文化比较繁荣的城市，又在城市和乡村之间双向传播，生存环境基本上是相同的。在正统文学观念的排斥下，二者都不能登大雅之堂，其地位也颇为接近。20世纪以来，词曲学始成为一门正式的学问。经过几代学人的努力，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

20世纪初期，由于现实的变化和观念的更新，梁启超、柳亚子、陈去病、陈独秀、王国维、姚华、胡适等有识之士纷纷关注词曲，并程度不同地介入词曲创作或研究。但作为一门学问，词曲学的奠基者是吴梅。

吴梅对词曲学的主要贡献是：

第一，阐明了词曲的价值。在封建正统思想的影响下，士大夫以留心词曲为耻。纪昀等奉命纂修《四库全书》，将词曲类置于集部的最后，称“词、曲二体在文章、技艺之间，厥品颇卑”，特

别是对于曲,“惟录品题论断之词及《中原音韵》,而曲文则不录焉”。吴梅则从渊源发展、创作动因、社会功能、审美作用等方面阐明了词曲的价值。如他在《董绶经校订〈曲海〉叙》中说:“余尝谓古今文字,独传奇最为真率。作者就心中蕴结,发为词华,初无藏山传人之思,亦无科第利禄之见,称心而出,遂为千古至文。考镜文学之源者,当于此三致意焉。”吴梅身体力行,既以满腔热情投入词曲创作,又以过人胆略将“不登大雅之堂”的词曲搬上大学讲坛,作为一门正规的学问传授给莘莘学子。吴梅的这些理论和实践,与梁启超、柳亚子、陈去病、陈独秀、王国维、姚华以及众多有识之士的理论和实践一起,对于转变一时风气,发挥了显著作用。

第二,澄清了对词曲史的总体认识。在吴梅之前,王国维已经对词、曲进行过分别的研究,写出了《人间词话》、《宋元戏曲史》这样重要的著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但这两项研究还有别于对词曲史的总体考察,因此王国维在对词、曲研究做出了重大贡献的同时,也对一些局部的、具体的问题发表了不尽妥当的意见。如对戏曲,王国维认为“明以后无足取,元曲为活文学,明清之曲,死文学也”(青木正儿《中国近世戏曲史序》转引),即为一例。吴梅则着眼于总体发展,对每一阶段的词曲创作做出了比较恰当的评价。在《中国戏曲概论》中,吴梅对明代戏曲作了分析,认为明代杂剧显然不如元代,但传奇“能以欧、晏、秦、柳之俊雅,与关、马、乔、郑之雄奇相调剂,扩而充之,乃成一代特殊之乐章,即为一代特殊之文学”。这是将词曲贯通起来的独到的见解。吴梅在考察明清两代戏曲的时候,充分考虑到戏曲作为综合艺术的特质,从戏曲的文学性、舞台性两个方面来看问题,因此得出了比较公允的结论。如此种种,都有助于人们对词曲史

的总体认识。

第三,推进了与实践相结合的词律、曲律研究。吴梅是一位词人,又是一位曲家,因此他的词律、曲律研究绝不是纸上谈兵,而是既注意总结前人经验,进行理论探讨,又与创作实践密切结合,让人们从创作实践中加深对词律、曲律的认识。

第四,培养出一大批词曲学研究人才。这些学者后来有的着重治词,有的着重治曲,有的词曲兼治,取得了各自的成就。但词曲双修,却成为吴门共同的治学传统。

业师万云骏教授是吴梅先生的弟子,得吴梅先生耳提面命十余年,在词曲方面具有很深的造诣,著有专著《诗词曲欣赏论稿》,并发表过《词话论词的艺术特征》、《晚唐诗风和词的特殊风格的形成与发展》、《清真词的艺术特征》、《清真词的比兴与寄托》、《王国维〈人间词话〉“境界说”献疑》、《〈蕙风词话〉论词的鉴赏和创作及其承前启后的关系》等重要论文,在学术界产生了较大影响。我在词曲方面的一点知识,得之于万先生的谆谆教诲,虽然先生的博大精深,我难以窥见万一,但继承先生遗志,培养词曲方向的研究人才,我还是勉力而为的。

李冬红同志是曲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师,曾师从高洪奎教授攻读硕士学位。她勤奋好学,2001年来华东师范大学攻读博士学位,2004年春顺利完成了博士论文《〈花间集〉接受史论稿》的写作。答辩委员会委员陈伯海(主席)、蒋凡、叶长海、齐森华、谭帆教授,评阅专家蒋哲伦、萧华荣、方智范教授皆给予好评,后又被华东师大推荐参加上海市及全国优秀博士论文的评选,经过两年的修改,即将梓行。

近二三十年,词学研究已成为学术界的热点领域,许多学者对唐宋以至近代的词从各个不同角度进行了系统而深入的研

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最近几年在人们不断采用新视角进行文本观照时,接受研究成为词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契入点。1986年,我写过一篇《词的接受美学》,是向第二届全国词学研讨会提交的论文,后来发表在《词学》第8辑,算是从接受角度研究词的一次初步的尝试。李冬红这篇博士学位论文,则是在更为坚实的基础之上的深入研究和大胆创新,即从接受史的理论原则出发,围绕着《花间集》这样一部在词史上具有奠基意义的选本展开研究,从历史意义和文本意义的双重角度,对《花间集》文本以及词学领域的许多重大问题进行重新评估,以一个全新的叙述姿态和动态眼光,来发掘《花间集》对中国词学的多重内涵、价值和意义。

文章的总体构想完整而严密,从《花间集》及其作品的传播、有关理论批评的探讨以及它在后世词的创作上的影响三个方面进行论述,正是抓住了文学接受活动中的阅读、批评和写作这三个基本环节,体现出接受的全过程。在传播问题上,通过版本情况和作品在后世入选的统计,反映出不同时期人们对《花间集》态度的变化,关于《花间集》版本传刻中体例变化、宋元时期接受空白现象、明代增补本出现所反映出的接受态度的研究,十分令人信服。在词学批评上,突出词的体性观、品性观、正变观、词史观和比兴寄托等这样一些重大理论问题,既能从词学发展史的大处着眼,对历史进程进行纵向梳理,又能紧扣《花间集》的接受观念对重点问题深入突破,并时时做出富有创见的结论。在词的创作上,勾画了自唐五代以至明清一千多年来在《花间集》影响下的词史发展轮廓,对各个时期词人的接受状况及其深层次的文化和社会因素作了系统而详尽的论析,其中“仿温现象”的描述和分析、梦窗词和《花间》的促碎的关系的探究、《花间集》和

《草堂诗余》在明代不同的接受状况及清代几位作家的分析,谈得尤其深刻,具有相当的理论深度。作者通过总观《花间集》的接受过程,对《花间集》的文学性质作了定位,认为《花间集》是世俗文化与士大夫文学相结合的产物,是雅俗文学完美结合的范例,论点新颖而独到。

论文虽然是对《花间集》的研究,但并非就事论事,而是从《花间集》研究为线索,由此及彼,因小喻大,其所论述,实际上已是一部中国古代词体发展及其观念批评的生动简史,颇富现代借鉴意义。论文是一篇极为用心之作,资料丰富庞杂而不给人以冗长推砌之感,观点新意迭出而无哗众取宠之意。作者在搜集资料、量化统计等方面下了大量的功夫,将十八位词人五百首词作在古今词选和词谱中的入选情况列表一一统计比较,精确详明,颇有学术参考价值。全文立论中肯严谨,文献引证充分得当,不作浮泛无根之谈,综合起来看,的确是《花间集》研究的可喜成果和词学研究领域富有价值的开拓。

当然,论文中也还存在一些不尽人意的地方,有些观点如对《花间集》的文学性质的低估、对王国维词论的部分评价似还可仔细斟酌,第二部分关于词学观念演变的综述,由于均按历史朝代渐次平面展开,内容略有交叉重复,是否可选取更好的阐述角度,更深一层开掘理论内涵。

曲阜师范大学古代文学学科有着深厚的学术传统,近年来学科建设又取得了长足的进展。处在这样优越的学术环境里,有各位师长的关心和指导,再加上自己不懈的努力,李冬红在学术研究中完全可以取得更多更好的成果,这是我殷切的期待。

目 录

序·····	1
绪论·····	1
第一章 《花间集》的版本流传和作品传播 ·····	16
第一节 《花间集》的版本流传 ·····	17
第二节 《花间集》的作品传播 ·····	54
第二章 《花间集》批评与词学 ·····	91
第一节 《花间集》批评与词的本体论的深化 ·····	92
第二节 《花间集》批评与词的正变观的沿革·····	134
第三节 《花间集》批评与词史观的构建·····	154
第四节 《花间集》批评与比兴传统的延伸·····	165
第三章 《花间集》接受与词史·····	185
第一节 《花间集》的内部模仿和“当代”影响·····	186
第二节 宋代的《花间》遗韵·····	209
第三节 金元的《花间》暗流·····	239
第四节 明代的《花间》流风·····	248

第五节 清代的《花间》余响·····	262
余论 《花间集》的雅俗之辨·····	281
附录·····	297
后记·····	342

绪 论

晚唐五代是我国历史上动荡不安的时代,却是词体创作的兴盛时期。这一时期的文学观念和审美标准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成为中国文学史上一道独特的风景。不仅民间词的创作非常繁盛,文人对“小词”也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并出现了我国第一部文人词集《花间集》,收录晚唐五代时期十八位词人的五百首作品,集中而典型地反映了我国早期词史上文人词创作的主题取向、审美情趣、体貌风格及艺术成就,同时也真实地体现了词由民间状态向文人创作转换的过程。从某种意义上讲,《花间集》大致规范了词体的文学体性和美学特征,在中国词史乃至文学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一向被称为“倚声填词之祖”。此时的词学观念以及创作活动,都为后代词体文学的发展提供了深刻的启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正负两个方面制约甚至规定着中国词史的进程。《花间集》自产生以来,吸引了一代又一代的读者和研究者,更是后代众多诗人词家效仿学习的范本,它之所以千百年来流传不衰,除了其自身具有的开拓性地位和艳丽深婉之特美外,更有赖于无数读者为之传递所付出的努力,这也正是本篇论文写作的缘起。

一、理论基础

以往社会历史的批评方法,从探讨作品的意义出发,挖掘作家与作品的深层关系,确实也解决了不少学术问题,诸如作品产生的社会历史原因,作家生平思想对创作的影响,一定历史时期的社会文化背景对作家作品的决定性作用等,但是,文学史是一种极为复杂的社会现象与精神现象,只采用一种研究方法难以展示其全面和真实的面貌。何况一部文学作品的流传,一个作家为人接受与否,除了其自身具备的内在价值之外,还有赖于适宜的传播渠道和舆论鼓吹,以及千变万化的读者接受形态。一部存在了千百年的文学作品必定有其不为人详知的沧桑历史,这绝不是用单纯的知人论世的方法所能究其全貌的。在中西文化交流日益频繁的今天,适当借鉴西方的一些理论方法或许有助于开拓我们的研究视野,深化研究论题。

20世纪60年代德国“接受美学”和70年代美国“读者反应批评”的兴起,使读者正式进入到文学的本体研究中。接受美学理论最大的一个启示,是作品只有经过读者阅读后才能实现其价值和意义。换句话说,一部文学作品,只有经过读者阅读阐释后,才能发挥和实现它的文学价值和社会功能。而且,作品的价值和意义不是一成不变的,一部作品,在不同时代或同一时代的不同读者那里,其价值和意义、影响和作用是不同的。在作品增值或减值的变化中,读者是一个重要的决定因素。因此,文学史不再只是单纯的作家和作品的历史,在更大程度上是作品被接受的历史,读者以自己的文化范型和心理模式吸收借鉴前人精华,进行再创造。对接受美学来说,读者不仅仅使历史的理解成

为可能,更重要的是,一代又一代读者的阅读形成了接受和影响的链条,清晰地显示出文学史的进程。

接受美学作为一种世界性的文艺美学理论思潮,70年代后在国际上产生了影响,80年代初也引起了我国理论界的关注,人们开始对接受美学进行思考,以及探讨中国式的接受美学是否存在。90年代以来,部分学者将接受美学的理论方法运用至具体的文学研究领域,并取得一些可观的成绩,如高中甫的《歌德接受史》^①、刘宏彬的《〈红楼梦〉接受美学论》^②、杨文雄的《李白接受史研究》^③等。然而,在人们热衷于运用西方批评学和阐释学,进行中国文学接受研究的时候,也难免给人以生搬硬套和牵强附会的感觉。

其实随着文学的不断发展,中国古典文论中早已产生了接受意识,并在实践当中逐渐上升为理性认识,成为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学接受理论,如先秦《左传》中的“赋诗断章,余取所求”,孔子的“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及“述而不作”,孟子的“知人论世”与“以意逆志”,汉代董仲舒提出的“诗无达诂”,都是强调对诗歌并无统一的理解,与文学接受可谓密切相关。魏晋南北朝时期,品鉴诗文、评价人物成为一时风气,文学接受活动进一步普及和深入,为后世接受理论的发展和丰富提供了有力的指导,进而形成了一整套接受理论,涉及接受目的、接受方法、接受特点、接受价值、接受主体、接受本质等诸多方面。明末清初王夫之《姜斋诗话》言:“作者用一致之思,作者各以其情自得。”^④金圣叹在《读

① 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

② 河南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③ 台湾成功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④ 《清诗话》,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3页。

第六才子书西厢记之二》中说：“西厢记断不是淫书，断断是妙文。今若有人说不是妙文，有人说是淫书，圣叹都不作理会。文者见之谓之文，淫者见之谓之淫。”^①极为概括地表达了接受美学的基本旨趣。到清代周济的“仁者见仁，知者见知”^②、谭献的“作者之用心未必然，读者之用心何必不然”^③，接受理论日渐明确和成熟。可以说，文学接受理论在中国古代文论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只是鉴于中国古典理论的长于感性体认、短于理性思辨的独特性，没有像西方一样形成一个严格的体系，因而未能产生太大的影响。但伴随着古典文学接受意识的加强和接受行为的普遍，它已悄然浸润在批评理论家的思维模式之中。

在关注西方接受美学的同时，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者也开始重温传统接受理论，并适当吸取国外接受理论的某些理念，把接受研究作为自己一个新的思路。作为其中一个分支的古典诗歌自不例外，词学界学者也进行了尝试。《词学》第八辑刊载了赵山林师的《词的接受美学》一文，可以说是对词体接受研究的一种新的启示。叶嘉莹先生将接受理论用于词的鉴赏之中，新意迭出，引起了国内同行的极大关注，并受到普遍的肯定。其实，在中国诗歌接受史中，潜藏着一部中国特色的接受阐释学。简要地说，“古典诗歌接受史就是诗歌本文潜在意义的外化形式的衍化史，是作品在不同阶段经读者解释后所呈现的具体面貌也就是读者阅读经验的历史，它通常体现为不同时期的接受者，包括普通读者、诗评家及诗人作家，对作品不断作出的鉴赏、阐释

① 《第六才子书西厢记》，中州书画出版社 1987 年版。

② 唐圭璋：《词话丛编》（第 2 册），中华书局 1986 年版，第 1630 页。以下所引该书语只注页码。

③ 《复堂词录序》，《词话丛编》，第 3987 页。

及在创作中的吸收借用等等”^①。在中国古代诗歌的发展史上，创作史与接受史始终紧密地相随相伴，历三千年而不衰，古典诗歌，历时弥久，历朝历代都存在着大量的接受材料和丰富的接受空间，为我们进行古典诗歌接受研究提供了足够的条件。着力于接受史的研究，可以通过考察作家作品在不同时代的地位升降，来审视各个历史时期的文学观念、审美观念和价值观念的发展变化及其原因。由此，本书选择了“接受史”这一西方引进的概念。但需要说明的是，本书的“接受”与西方接受美学的“接受”并不是等同的，之所以用“接受”这个词，有两个原因：一是前文中所提到的，本书的论述角度是从读者的接受切入的，讨论的是读者眼中的《花间集》的历史；一是因为在中国古代文学理论范畴中，很难找到一个词语，能够完全涵盖本书所要论述的三个方面，而“接受”这一词语正可胜任。

二、选题依据

众所周知，《花间集》并不是一个完全统一体，它所代表的不是一个固定的封闭流派，内中存在着许多差异，这是本篇论文首先要解决的问题，也是能否对《花间集》的接受史进行全面整理的一个关键。《花间集》中的作品风格繁多，但它们产生于非常相近的时代，在大致相同的文学环境中生长，有着相对统一的艺术风格、审美趋向和价值评判，欧阳炯在序言中已俨然把它们作为一个整体看待。随着词体文学的发展，后世的词人和词评家

^① 陈文忠：《中国古典诗歌接受史研究》，安徽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0页。下引该书语只注页码。

们都自觉地把“花间”作为一种类型风格、一种创作形式、一个传统或一个词源进行考察和研究，“花间范式”^①遂建立起来，“花间”也成为词学批评领域中的一个专用术语。刘扬忠先生认为，《花间集》付梓印行之时，“中国词史上第一个流派算是打出了旗号，露出了阵营，显示了群体的风格和力量”^②。并列举了构成“花间词派”的四个基本条件：

1. (花间)十四人虽未聚集在一个团体内，但他们曾先后在同一地域、同一社会环境、同一文化氛围和同一审美习尚中创作过一种体式相同、题材取向相近、审美趋向有相当一致性的精美“诗客曲子词”。《花间集》的编者把这些人的词选编为一集，虽未必是出于标榜宗派的动机，却实际上起到了总结和追认一个词派的作用。《花间集》的编者把不是西蜀词人的温庭筠、和凝等人的词也入选，这并非“乱攀亲”，而是很严肃地认祖宗和认朋友，是为这个词派标示源头和指示同道者。因此，《花间集》中这十八个词人，可视为一个松散的流派，一个虽无组织联系和交际唱和关系但毕竟在艺术上有相似趋向的流派，一个代表我国从九世纪三十年代至十世纪四十年代这一百多年间文艺新时尚新风气的流派。

2. “花间”派有一个展示其创作实绩和群体风格的选本——《花间集》，更有一个表明群体的创作观和审美观的宣言——由群体中重要成员欧阳炯撰写的《花间集叙》。

3. “花间”派拥有两位成就卓绝、足供其追随者学习和

① 参见王兆鹏：《宋南渡词人群体研究》下篇第七章，台北文津出版社1992年版。

② 刘扬忠：《唐宋词流派史》，福建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64页。下引该书语只注页码。

崇仰的宗主——温庭筠和韦庄。

4. “花间”十八家尽管大多各有一己独擅的艺术风采和个性特点,但从群体形态上看却显然有着一致的风格体貌和审美倾向。这主要表现在:一、都专写小令;二、都以爱情相思、离愁别恨为主要描写对象;三、都倾向于追求和表现阴柔之美,词风大多以清切婉丽为尚;四、都以诗言志,以词言情,视词为“艳科”,为娱乐性的另一样式。^①

在当今词学界已把《花间集》作为一个特定概念的大背景下,本书首先把《花间集》作为一部作品,或者说作为一个整体进行历史的梳理和逻辑的阐释,同时在评述的过程中,视接受材料的可行性,注意对其中的个别现象作适当的辨析,尽量避免以偏概全。论文之所以选择《花间集》接受史作为研究对象,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一)20世纪以来,随着词学研究队伍的扩大、词学观念的转变和研究方法的不断改进,《花间集》在综合考论和个体研究方面都取得了丰硕的令人瞩目的成果。90年代以前,《花间集》研究主要集中于其地位影响的评价、内容题材、风格特色、体制调式、语言艺术、表现手法及词人生平考证等问题。首先体现在一大批《花间集》新的文献整理成果上,出现了诸多《花间集》的评点、校讎、考据和注释的著作^②,为《花间集》研究的深入奠定

^① 《唐宋词流派史》,第71~72页。

^② 如:王国维的《唐五代二十一家词》,李一氓的《花间集校》,李冰若的《花间集评注》,陈尚君的《花间词人考证》等。华连圃、萧继宗、李谊、沈祥源、王新霞等人所作的《花间集》评注工作,从20世纪30年代延至世纪末,总体上呈现先修未密、后出转精的态势,不仅相应地作了一些文字校勘,而且充分考虑了不同的接受对象,使注释体例完成了由传统的传注体向通俗性的鉴赏语体过渡,读者覆盖面随之拓展了。